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八

许 钧 主 编

中 国 翻 译 史

(上卷)

A SE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马 祖 毅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翻译史 上卷 / 马祖毅著.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 8)

ISBN 7-5351-2534-4

I. 中… II. 马… III. 翻译-历史-中国-古代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242 号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电话: 8544373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通山县印刷厂 (437600 · 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5 插页 25.5 印张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626 千字

印数: 1—3 000

ISBN 7-5351-2534-4/H · 87

定价: 34.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诗 代 前 言

洪荒造塔语言殊，
从此人间要象胥。
交际万方成大业，
壮夫何用笑区区。

翻锦看花态总殊，
也曾捻断几茎须。
脚翻旬月名方立，
始信严翁未诳吾。

达志通情管送迎，
友谊花灿树常荣。
舌人碌碌风尘里，
青史无情不记名。

穷年矻矻志难摧，
窃火甘当职业媒。

身后先驱虽寂寞，
乘凉人念树谁栽。

绮年梦笔不生花，
多少闲情付落霞。
皓首穷搜编译史，
柴门栽出一篱瓜。

马祖毅于求得一斋

1998年12月23日

概 说

洪荒造塔语言殊，
从此人间要象胥。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操不同语言的人们要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必须通过翻译作为中介手段。就中国而言，远在原始社会各氏(部)族之间，就应该有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翻译活动，然而已无文献可证。即使在夏、商两代，现存的史料亦均失之过简，如《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有下列记载：

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

“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族并非同一部族，语言有殊，遣使“来宾”，自然需要翻译，否则无法进行活动。然而，这样说只是推测，拿不出证据。只有到了周王朝，才留下官方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见《周礼》和《礼记》。因此撰写中国翻译史，只能从周王朝开始。

从周到清的各代王朝，与周边诸民族和外国交往，都设置了配有译员的外事机构，如周有大行人下属的象胥，秦有典客和典属国，两汉有大鸿胪和尚书主客曹，魏晋南北朝及隋有大鸿胪或鸿胪寺和主客司，唐有鸿胪寺、中书省和礼部下属的主客部，宋有鸿胪

寺、客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元有礼部下属的会同馆，明有鸿胪寺和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吏司，清有鸿胪寺、理藩院和礼部下属的会同四译馆以及后来改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关于译员的称谓，周王朝按东南西北四方分别命名为“寄”、“象”、“狄鞮”和“译”，又总称“舌人”，当时主要从事口译。西汉王朝与北方的匈奴打交道最多，于是有“译官”、“译长”之设。译人、译语人遂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文雅一点，则称译人为“象胥”或“寄象之才”。辽朝始定口译者为“通事”，金、元、明、清皆因之；又定笔译者为“译史”，金、元因之。明朝的笔译人员，主要是四夷馆里的“译字生”。清朝特设“笔帖式”，从事满汉文字的互译和抄写，配置在中央和主要的地方机构内；而为出使外国大臣、领事、副领事所配备的口笔译兼顾的人员，则统称“翻译”和“翻译官”。二十五史所载各代的外事活动，往往略而不提口译人员，即使述及，亦不记姓名，尽管他们付出了不可缺少的大量劳动，因此我有诗叹曰：

达志通情管送迎，友谊花灿树常荣。

舌人碌碌风尘里，青史无情不记名。

至于笔译人员的劳动成果，仅是收录在外国传里的若干外国贡表而已，亦不知译者为谁。

关于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正史中有文献可考者，是元朝所设的中央一级“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地方一级“诸路蒙古字学”。明朝则有“四夷馆”的设置，下辖蒙古、女真、西蕃、回回、西天、百夷、八百、高昌、缅甸、暹罗等十馆，教授外族和外国的语言文字。满清取代明王朝时，接收了“四夷馆”，改名“四译馆”，继续招生，后并为西域、八夷两馆，复与会同馆合并成“会同四译馆”，属礼部。康熙、雍正年间，开始与西方（主要是沙俄）接触交往，四译馆所授语言，已不敷用，乃先后建立了俄罗斯文馆与拉丁文馆。鸦片战争后，与英、美、法、俄等西方国家交涉日多，于是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京师译学馆等的创办，教授英、法、俄等国语言，培

养翻译人才,为外事服务。

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民族包括在历史上已经被融合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繁荣和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而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各民族的翻译活动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撰写中国翻译史时,便不能单纯着眼于汉族的翻译活动。故本卷相应地介绍了从周到清国内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例如,历史上的契丹和女真族主要从事于汉籍翻译;藏族、西夏党项族、蒙古族、满族主要从事于汉籍和佛教文献的翻译,彝族则主要从事彝文典籍的汉译。使用察合台维吾尔文时期的新疆维吾尔族,情况特殊,则主要从事于波斯、阿拉伯文献的翻译。在佛经翻译方面,藏文佛经主要译自梵文,西夏文和蒙文佛经多转译自汉文和藏文。高昌回鹘族(西州维吾尔族)的佛经,则译自古库车文、古焉耆文、藏文和汉文。云南傣族的佛经,则译自巴利文。因此,金克木先生说:

我国有一大笔文化遗产现在没有整理,这就是那些从古代印度传来的佛教文献。大略有以下几项:

一、汉语译的佛教文献,即《大藏经》中的原著部分。

二、藏语译的佛教文献,即《甘珠尔》、《丹珠尔》。蒙古语译文可以算在这一系统之内。

三、新疆和别处发现的古代一些兄弟民族语言文字写的或译的佛教文献。

四、傣族的所谓‘贝叶经’,其中应有抄写下的或翻译的佛教文献。

五、西藏、新疆等地区陆续发现的古代印度语的各种字体写本,还有附汉译或藏译的原文写本或木刻本,各种文物中附的不同文字的印度语原文,这些也多半是佛教文献。

以上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财富,也是世界文化

的,尤其是印度文化的重要资料。((《文化厄言》))

从周到清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内,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两次西学翻译。

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是古代印度文化与中华固有文化,亦即东方文化之间所进行的互补性的平等交流。两者之间,虽有抵牾,但终于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之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印度佛教在传入时即依附和迎合本土文化;第二、印度佛教本身也具有与中华文化相近或相通的因素,而且包含着可以补充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定内容,因为“他们都是古代东方学者对人类自我反思的认识成果”(方天立语)。

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两次西学翻译,是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与相对落后的中华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已打破了平等格局,并且带有巨大的冲击性,而以后一次交流为尤甚。

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其主要内容是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以及17世纪自然科学的若干新发现。基督教义,虽在唐代(景教)和元代(天主教)两次传入,但仅流行数十年即告中断,如昙花一现,影响不大。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奉教廷之命东来,其人数之多,译著之富,传播地域之广,均胜于前。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两种文化的冲突。明清两代所兴起的“教案”,即是明证;排斥传教士的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得已》)。当时有识之士,虽有皈依天主教者,但他们对宗教的热情并不太高,尽管科学家徐光启曾有意利用基督教义来“补儒易佛”,但他们所热衷于学习和研究的,是传教士引进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目的在于用以反对当时“土直天下之实事”的“名理之儒”和“谬言数有神理”的“妖妄之术”,把

科学从理学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试图以会通求超胜,达到国富而兵强。当然,明末和清初的交流情况,也应加以具体的区分,其中亦有差异。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局限在上层的少数有识之士的圈子之内,并没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能算是一个序幕。

与这一次相比,从鸦片战争后到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其规模要巨大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而此时的中国国势,也已今非昔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列强环伺侵袭之下,救亡图存,保国保种,已成为第一要务。爱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向西方寻求真理。此时期所引进的西学,主要内容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兴起的现代科学技术、进化论学说、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古典哲学和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西学的传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西学输入以洋务派为主,其范围主要限于实用知识、应用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部门。他们主张“中体西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甲午之战惨败,洋务运动破产。国势之危,岌岌不可终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主张走变法维新的改良道路,发展到采取革命手段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特别在戊戌变法流产以后),从而使这阶段的输入西学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输入的内容,则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为主。勃然兴起、波澜壮阔的留学风潮,又大大推进了这一输入运动。又由于留学者以去日本的人数最多,日本遂成了输入西学的中转站,即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通过日本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在这一阶段内,文学翻译(主要是外国小说的翻译)也形成了极度繁荣的局面,译家辈出,译种繁多。文学作品之翻译,也密切配合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向全国人民输送思想营养,激发团结御侮、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宣传民主、自由、平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从总的方面说,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启迪民

智的作用。所以现在回头来评价当时的文学翻译,不能纯粹与外国作者、作品的正统地位挂钩,认为译者缺乏文学判断力,翻译能力不足或态度不佳,应该考虑到当时翻译的社会需求和标准,对之作出客观公平的评价。

从周到清的翻译活动中,翻译家们也曾总结过实践经验,探索翻译规律,虽无长篇巨制的系统论著,但其吉光片羽,亦颇足珍贵,有待于整理研究。现举其荦荦大者,如佛经翻译方面,有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在西学翻译方面,有徐光启的“会通超胜”,李之藻的“真、实、奥义”,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傅兰雅的科技译论;在文学翻译方面,有王国维的《译本〈琵琶论〉序》,苏曼殊关于译诗的论述。其他,如藏族、蒙古族在佛经翻译方面有梵译藏、藏译蒙的论述,魏象乾有汉译满的《繙清说》。如此等等,均有助于建立中国自己的翻理论体系。

目 录

CONTENTS

(周代—清代)

概说·····	1
第一章 从周到清各朝外事机构之沿革与口笔译活动·····	1
第一节 周、秦与西汉·····	1
第二节 东汉、魏、晋、南北朝与隋·····	8
第三节 唐朝·····	23
第四节 宋、辽、金与元朝·····	33
第五节 明朝·····	42
第六节 清朝·····	56
第二章 宗教文献的翻译·····	91
第一节 佛教文献的翻译·····	91
一、汉文《大藏经》——从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	91
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西藏地区翻译 佛教文献之概况·····	185
三、高昌回鹘族(或西州维吾尔族)的佛教文献翻译·····	201

四、西夏党项族的佛经翻译	209
五、云南傣族的佛教文献翻译	215
六、蒙古族的佛教文献翻译	217
七、满文《大藏经》的翻译	221
第二节 基督教文献的翻译	222
一、唐代景教徒的翻译活动	222
二、元代天主教徒的翻译活动	235
三、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宗教文献翻译	237
四、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翻译宗教书籍之概况	243
第三节 摩尼教经典的翻译	249
第四节 回族学者对伊斯兰教文献的翻译介绍	252
第五节 道教《太上感应篇》的彝译	264
第三章 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互译	266
第一节 古代百越语的翻译	266
第二节 匈奴民歌的汉译	272
第三节 白狼王三歌的汉译	274
第四节 十六国和北朝民歌的汉译	278
第五节 吐蕃时期的汉籍藏译	288
第六节 契丹政权的汉籍翻译和译史、通事的设置	300
第七节 西夏党项政权的汉籍翻译	309
第八节 女真政权的特设翻译职称和翻译活 动	319
第九节 蒙元的特设翻译机构和翻译活动以及元亡后蒙古 族的汉籍翻译	325
第十节 新疆维吾尔族使用察合台维吾尔语时期的翻译 活动	363
第十一节 彝族的翻译活动	373
第十二节 清朝的特设翻译机构与翻译活动	377

第四章 明代以前及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	408
第一节 从东汉末到明初的科学翻译	408
一、医术药物方面	408
二、天文历算等方面	424
第二节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西学 翻译	439
第五章 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西学翻译	509
第一节 组织翻译的第一人——林则徐	509
第二节 西方传教士的西学译介	517
第三节 洋务派机构的西学翻译	550
第四节 甲午战争后的西学翻译	571
第五节 译名统一问题	654
第六章 从东汉到清代的文学翻译	659
第一节 从东汉末到清代同治年间的文学翻译	659
第二节 光宣年间(1875—1911 年)的文学翻译	700

第 一 章

从周到清各朝外事机构 之沿革与口笔译活动

第一节 周、秦与西汉

周朝国君姓姬,相传是帝喾后裔弃的子孙,世代重农。从公刘起居豳(今陕西旬邑县),到第 10 世古公亶父因受戎狄侵略,被迫迁居岐山下周原(今陕西岐山县),筑城郭居室,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周国。公元前 11 世纪中叶,武王伐纣,取商而代之。后周公杀武庚,实行大封建,让周王的子侄、同姓贵族和异性贵族于王畿(方千里,是王的直接统辖区)之外建立封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和势力范围外,还有许多部族国家,这些国家与周并非同姓,亦非同族,语言有殊,若来朝贡,势必有双语人或多语人为中介,方能交流思想。《册府元龟·外臣部》就有外族或外国前来朝贡的记载:

周武王克商,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以戒王。自是道通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弩,长尺有咫。

后芒即位三年,九夷来御。

宣王时，追貌之国来贡。故韩奕之诗曰：“猷其貔皮，赤豹黄黑。”

西旅、肃慎、追貌等外族的贡使来了，必有接待之处，语言不通，又必有传译之人。因此，在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中，遂有周代外事机构和翻译职称的记载：

一、《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十二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

二、《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象胥，乃大小行人的属官。按《周礼》：“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大戴礼记·朝事》云：“《礼》：大行人以九仪别诸侯之命，等诸侯之爵，以同域国之礼而待其宾客。”小行人，是大行人的副手，“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周礼》）。由此可见，象胥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接待四方民族和国家的使节与宾客以及通译事宜，下属办事人员，有上士、中士、下士和徒等 31 人。考之周代诸侯官制，上士是居于大夫之下的士一级爵位的第一等，中士和下士各居第二和第三等。

这里要先谈一下“中国”和“四方”。

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之外的人。这种区分，十分明显。不过，中国、夏、华这三个名称的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高文化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这些族国所居之地，称为四方。（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 1 册）

周代时的“东方”，多在今山东省境内。那里有莱夷、任、宿、须句、颛臾、邾、莒、小邾、杞、介、郯、根牟，通称为东夷。凡翻译东方

诸族语言者，称之为“寄”。孔颖达疏：“寄，言传寄外内语言。”

周代时的“南方”，指长江汉水两流域的蛮族所居之地，有群蛮、百濮、卢戎等，通称南蛮；又指淮水流域的夷族所居之地，小国有舒、六、蓼、舒蓼、舒庸、舒鸠、宗等，大国有大徐，通称淮夷。凡翻译南方诸族语言者，称之为“象”。孔颖达疏：“象者，言放（同仿）象外内之言。”

周代的“西方”，在今山西、陕西、甘肃一带，有大戎、小戎、骠戎、犬戎、姜戎、茅戎、扬拒、泉皋、伊雒之戎。戎族酋长戎子驹支曾经说过：“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那里还有白狄、赤狄。赤狄有皋落氏、廆咎如、潞氏、留吁、铎辰。这些通称为戎狄。凡翻译西方诸族语言者，称之为“狄鞮”。孔颖达疏：“鞮，知也。谓通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

周代的“北方”，在今河北省境内，有北戎、甲氏、鲜虞、肥、鼓、无终，通称北狄。凡翻译北方诸族语言者，称之为“译”。《论衡·变虚》说：“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虽五帝三皇不能去译。”孔颖达疏：“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

在周代，译员除上述职称外，又统称“舌人”。据《国语·周语》：“夫戎狄冒没轻儇，贪而不让……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韦昭注曰：“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职也。”古代又称外国语言为“反舌”，见之于《吕氏春秋》高诱注：“戎狄言语与中国相反，故曰反舌。”故孔子说：“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大戴礼·小辨》）。

周代诸侯之国也设有行人。如当时的吴国，是周太王之子太伯所创建。太伯让位于其弟季历，“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狐庸）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荆蛮语言，不同于中国，故其在“通中国”时，必有译人。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同贄）；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

其使请曰：“吾受命于吾国之黄耆日久矣。天下之无烈风雷雨，意在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

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

来使与周公的应对，记得比较具体。须知这是通过三道翻译手续才能彼此交流思想的。这段文字，兴许是我国最早的口译记录。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周代之行人为典客，又另设典属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七上》说：“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又说：“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看来典客与典属国在职责上有所分工，前者处理有关归顺的蛮夷之国的事务，后者则处理直接统辖的投降的蛮夷之事务，由于言语不通，当然需要译员，只是未明文记载罢了。

西汉因秦制，初设典客，“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改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王莽改大鸿胪为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汉书·百官·公卿表七上》）。大鸿胪，乃九卿之一，掌周边民族君长、诸侯王、列侯的迎送接待；安排朝会、封授、袭爵及夺爵、削地之典礼；诸侯王死，则奉诏护理丧事，宣读谥策谥号；百官朝会，掌赞褻引导；兼管京师之郡国邸舍及郡上计吏之接待。照此看来，只有在周边各族和外国遣使来朝时，大鸿胪下属的译官令及其副手译官丞才有活动。

《汉书》“帝纪”中所记载的外事活动，计有：